

中医典籍英译批评:成绩、问题与对策

沈洁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225100)

摘要: 翻译批评承担着反思和引导翻译实践的重任。中医典籍英译批评研究成果不断取得新进展,但仍存在“显性”批评研究缺乏理性指导、“隐性”批评研究存在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缺乏批评的伦理关涉等问题。中医典籍英译批评应当加强理论建设,分层次求“真”、论“效”和向“善”,构建多元一体的批评模式。

关键词: 中医典籍;英译批评;成绩;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H315.9

中国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随着中医价值逐渐获得认可,国际上有关中医学的交流与研究日益增多。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载体,中医典籍大多产生于距今久远的年代,其内容兼具知识性、历史性、文学性和文化性,具有独特的文本特征,与同源文化中其他种类的典籍在思想、内容和文体等方面相互映衬、形成互文。中医典籍英译不仅能够传播本国传统医学的思想精髓,为世界医学研究提供新思维、新方案,还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推广和交流,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典籍译者身处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之中,拥有不等量的中西医文化和理论知识以及不同的翻译观、文化立场和英译目的,必然会生产出有差异的译文。评判这些差异涉及中医典籍英译批评。目前,国外中医典籍英译者多而批评者少,译者与同行专家常因为自身的“异文化”立场而采纳跨文化、跨学科(中西医学)对比视角,重视解决英译中的理解性障碍,表现出强烈的探古求知欲望。反观国内,随着中医文化在海外传播日渐广泛,影响日益深入,中医典籍英译研究逐步向纵深发展,形成了诸多热点,只是批评研究仍然“较为零散,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1]。本文拟对国内中医典籍英译批评研究的已有成绩和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和回顾并探寻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

一、成绩和问题

(一) 已有成绩

过去,有关中医典籍英译的研究只零星出现。自2005年起,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开始选译中医药文化典籍,“掀起了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高潮,也带动了相关英译研究走向繁荣。”^[2] 本文以“中医典籍”并含“翻译”或“英译”为主题词分别在中国知网(CNKI)中进行检索,结果发现,2005年后中医典籍英译研究成果呈明显上升趋势,发文数量多次经历跳跃式发展,见图1(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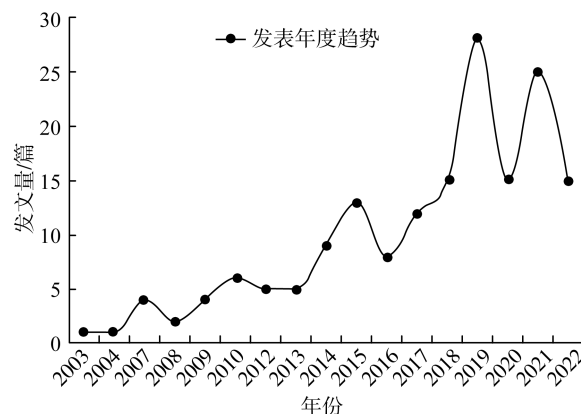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2年国内中医典籍英译研究年发文量趋势图

收稿日期:2023-10-24;修回日期:2023-12-13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诸子典籍英译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22ZDA291);202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医典籍英译批评话语构建研究”(23YYB005);扬州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实践哲学视域下中医典籍英译批评研究”(xjj2023-36)

作者简介:沈洁,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典籍翻译。

E-mail: 972221751@qq.com

引文格式:沈洁. 中医典籍英译批评:成绩、问题与对策[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4):1-6.

通过爬梳文献(2000—2022年)我们发现,国内中医典籍英译批评研究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批评研究即明确以批评为旨归,或依据翻译批评理论和模式所开展的研究。此类研究数量不多,早期一般是译者自身的所感所思(李照国^[3-5]),或他人对译作语言的述评和商榷(施蕴中等^[6],兰凤利^[7]等)。“隐性”批评研究则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翻译研究只要与具体译作、译者或其他具体的翻译现象有关,都具有翻译批评的性质。”^[8]³ 此类研究大致遵循以下批评路径:(1)借鉴多元理论,评论英译策略,如兰凤利等^[9],王彬、叶小宝^[10],李孝英、赵彦春^[11]等。(2)结合历史处境,评价译者行为,如范延妮^[12],杨丽雯、王银泉^[13],王尔亮、陈晓^[14]等。(3)依据读者接受,评判译作优劣,如蒋基昌、文娟^[15],殷丽^[16],张晨晨、谭业升^[17]等。

这些“隐性批评研究”散见于有关中医典籍英译的译史、文化、译者、策略、术语和传播研究等热点当中,其中不乏由理论更新、方法创新带来的真知灼见和新的评价意见,为系统开展批评奠定了重要基础。例如,在微观的翻译策略层面,王彬、叶小宝^[10]通过对比多名中外译者对“气”概念的不同英译,旨在说明针对此类内涵丰富、所指多元的概念英译应当根据其使用语境采用差异性的策略。黄培希^[18]经过分析认为,副文本“通过阐释、补偿、变通等手段在译本中有效地建构了翻译文化,从而解决了翻译过程中文化传递的种种困难”。张焱、王巧宁、张丽^[19]将汪榕培的“传神达意”翻译思想与“深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也译作“丰厚翻译”或“厚译”)概念相融合,进而分析和评价文树德(Paul U. Unschuld)《黄帝内经》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特色与译文质量。蒋辰雪^[20]同样认为,文氏所采用的“深厚翻译”策略具有“意义阐释”“背景描述”“分层递进”“深层铺垫”等功能,能够“赋予译文能量”“促进文化交流”和“提升翻译层次”。蒋基昌、文娟^[15]和李洁^[21]则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学分析,获取了中医学专业外国留学生对中医典籍多个译本的满意度。二者的实证调研结果不尽相同,分别形成了各有侧重的评论观点。

在宏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交流视野下,范延妮^[12]致力于总结近代西方传教士译介中医典籍的原因、特征、外部影响因素和英译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等,在此过程中形成对传教士群体译介活

动的评价。袁玮蔓^[22]则描绘了晚清时期来华德国人对中医典籍的译介和解读,肯定他们的译介行为对“德国中医研究、热带医学和汉学研究”发展皆产生了重要影响。针对20世纪中期美国医史学家威斯(Ilza Veith)首次系统英译的《黄帝内经·素问》,王尔亮、陈晓^[14]认为,“这部译作得以出版,对中医典籍的对外交流来说,已经是迈开了一大步,这一贡献值得当今学者尊重。”进入21世纪,德国医史学家文树德在英译《黄帝内经》时尊重原文以单字表意的语言特征,尽可能按照原文语序逐字直译,其与众不同的翻译风格在西方引起了较大争议。张晓枚等^[23]明确褒扬,称文树德“这种忠于原著、忠于历史的翻译态度对中医古籍的翻译和文化传播意义重大,有助于西方学习中医者领会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等等。

虽然此类隐性批评研究数量丰富,推动着中医典籍英译批评不断取得新进展,但从整体而言依然存在显著问题。

(二) 现存问题

1. “显性”批评研究缺乏理性指导

过去二十年,相较于蓬勃发展的其他研究热点,针对中医典籍开展的“显性”批评研究并不多,显得十分薄弱。在文献检索时段前期,肖平^[24]、施蕴中等^[6]、兰凤利^[7]、李照国^[5]等曾“谈论”“评析”或“述评”《黄帝内经》的某些译本。这类批评并无理论指导,而是建立在深厚学养之上的主观鉴赏,形成了诸如“贴近原作、生动传神”的评语,具有“品鉴式”或“纠错式”的特征。目前,国内翻译批评理论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偏重文学的倾向,既没有将文言文科技典籍的特殊性纳入考察视野,也“没有从理论层面针对‘中译外’这一新的翻译形式下的翻译的标准观与价值观等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25]。这便导致中医典籍英译批评研究较少有深刻的理论探索,批评依然存在过去的“两种不良倾向——‘文本比较批评’(显微镜式)和‘印象主义批评’(望远镜式)”^[26]。在文献检索时段后期,部分研究者逐渐能够有意识地探讨批评的标准和方法,或利用批评理论指导研究,如胡艳^[27],刘明等^[28],郭添枫^[29]等。这反映出针对中医典籍英译的“显性”批评研究产生了理性化和理论化的意识与趋势,但在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 “隐性”批评研究存在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已存在节译、编译或全译的中医典籍有《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千金方》《本草纲目》《针灸甲乙经》《濒湖脉学》《脉经》《脉诀》《洗冤集录》《温病学》《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救荒本草》《名医必录》《医药汇录》《饮膳正要》《敦煌医学卷》《汪机和石山医案》^[2],等等,而有关中医典籍英译的“隐性”批评研究大多仍以《黄帝内经》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者们能够有意识地运用诸如翻译美学、接受理论、文化翻译理论、文本类型理论、功能理论、纽马克翻译理论、生态翻译理论、目的论等多种理论学说归纳译文特征和述评英译策略,但就批评而言,研究不仅大量聚焦静态文本的微观字词(文化负载词、核心概念、中医学术语)和特色修辞(比喻、借代、通感、对偶、顶真、排比、回环、叠韵、省略等),且其中存在不少浮于表面的理论借用,即仅根据少量语料便得出译本“优劣”的结论,或套用理论,却陷入了理论自证的循环。简言之,因为“隐性”批评研究本身并非以批评为旨归,所以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虽然偶发评论,却难以窥得全貌,常出现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

3. 缺乏批评的伦理关涉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之下,翻译批评应当“以介入的姿态,关注并正视当下翻译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良倾向,发挥其应有的警示与建构力量”^[30]。“建立一定的翻译价值观是进行翻译批评的基础”^[31],而“翻译伦理研究有助于明确翻译活动的本质、确立翻译价值观”^[32]。中西方翻译批评研究者都曾表达过对“翻译伦理”的关注,如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皮姆(Anthony Pym)、许钧、吕俊、侯向群、刘云虹、王大智、蓝红军等。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中医典籍英译批评仍然是规定性或描写性的。许多解释性的批评研究似乎默认“只要具有文化和功能性事实的基础,一种行为模式就是合理的”^[33],但事实上,任何描写或解释都难以将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批评的各方如果囿于自身所持理论和立场,得出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大量翻译史实告诉我们,翻译活动不仅深受生活世界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我们

所处的世界。中医典籍英译批评不仅需要关注文本的语言特征和英译结果以及译者所处的历史情境和行为效果,同时还要关照以翻译为载体的跨文化交往的合理性,即伦理道德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使批评超越特定的历史、立场和特殊的文化,实现其指导未来实践的导向性功能。

二、对策

新时期,翻译批评研究在整体上已经“从单向批评走向双向批评”“从关注翻译的静态结果走向关注翻译的动态过程”“从注重文本分析走向注重读者接受”“从经验性的评判走向科学、理性的批评”^[34]。本文认为,中医典籍英译批评应当与翻译批评研究的总体趋势相适应,加强理论建设,逐步建构起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和多元视角的批评模式,使批评者不仅能够立足于文本,满足批评的基本需求,还可以站在译者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考察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更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超然于翻译过程之外”^{[8]45},从而更加清晰、全面地把握现象之下的本质,针对译文做出更加客观、合理的评价。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中医典籍英译批评可以分三个层次依次展开,各个层次批评依据不同的标准,侧重不同的内容,多维度评判典籍译本及译者行为,最终形成对批评对象的完整认识。

(一) 尊重典籍文本特征,批评求“真”

“中医药走向世界,准确翻译是第一步。”^[35]中医典籍英译批评对求“真”有着很高的期待和需求。这与中医典籍原文的文本类型、学科属性和语言语体特征等皆有很大关联。首先,作为古代科技类文本,中医典籍以阐发基础理论和指导临床实践为第一要务,其语言释义的开放度较低,同时受到语言的自为性规律和中医学理论学说的双重限定与规范。其次,中医典籍所著述的医理学说自成一体,且迥异于西方医学。正确理解和传递中医学思想理论,而非简单粗暴地“以西释中”,或生硬地逐字对译,是对译本求“真”的基本要求。再次,中医典籍大多使用古文撰写而成,随着时间推移和语言发展,其文字表意便产生了一定的模糊性;同时,中医学理论阐发独具“取象比类”思维,使得典籍文本兼具大量文学表达特征,这不仅给译者造成了理解上

的困难,也形成了英译策略选择当中的“文”“质”之争,批评有必要对此予以客观呈现。综上,中医典籍英译批评必须从文本出发,批评求“真”。

何为批评求“真”?刘云虹^[36]将“求真”作为批评主体应当树立的一种精神,即要求批评主体有“真知灼见”,有“真实情感”,并有“真诚、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周领顺^[37]则将“求真”定义为“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本文所指的批评求“真”与中国传统译论中“案本”“求信”的翻译要求意思接近,是在静态的文本语言分析和对比中评判译文是否真实传达和完整保存了原文的信息。根据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对翻译的定义,这里所说的“原文的信息”(source-language message)同时包含“语义”(meaning)和“文体”(style)两方面内容。就中医典籍英译批评而言,求“真”便是以“真”为标准,一方面,评判译文语义是否在宏观层面符合中医学医理学说,在中观层面沿用了中医学概念体系和在微观层面正确传达了字词句义;另一方面,判断译文语言是否保留了典籍原文“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文体风格,如大量使用的形式性修辞和意象性修辞。

(二)挖掘译作实然价值,批评论“效”

批评若站在译者的立场,便需要超越封闭的文本对比,尽可能将一切外部影响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译者既是“语言人”,也是“社会人”,其翻译行为既需“求真”,更要“务实”,译者行为是否“合理”可以从行为效果的维度加以说明。无论翻译发生于何种复杂的历史情境之中,历时来看,译者所采用策略的效果、译文在目的语社会中的接受效果、译者的目的达成效果和文化在异域的迁移效果皆有据可循。站在旁观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译者既受到种种影响因素的制约,也可能产生反向作用,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翻译批评是与价值判断密不可分。”^[38]从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价值“被解释为事情在它们所完成的结果方面所具有的内在性质”^[39]。批评论“效”首先是将译者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对译者的翻译行为加以描写、分析、解释和评价;其次便是考察译者行为对双方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学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评判译作的实然(已然)价值。

例如,当威斯1949年着手英译《黄帝内经·素

问》时,西医在全球范围内强势盛行,而中医在国内一度面临生存危机,毋宁谈交流与传播。威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所属社会文化和“医学共同体”的解释传统影响,加之当时在美国,可参考的资料匮乏,且“中国留学生当中难以找到同时通晓中国古代文献和哲学,并接受过旧式‘小学’训练之人”^[40]^{xi},威斯无奈之下只能独自应对理解和解释原文的困难。除了在英译过程中“自制术语词典”(未公开出版)和“参考相似的语句”之外,还“因时制宜”地采用了一些具体的英译策略。译文虽然存在较多对句法、字词和修辞的误解,却在目的语社会中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不仅多次再版,且在全球图书馆的馆藏量高达1 044本^[16]。尽管威斯“以西释中”的英译不能解释和概括《黄帝内经》所包含的全部经验,但这一策略符合当时目的语社会读者对中医学的整体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需求,因此在目的语社会得到了广泛接受,甚至在中医发展处于颓势的历史时期为中医文化西传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从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效”值。

(三)重视批评导向作用,批评向“善”

许钧^[41-42]指出,翻译伦理应该注意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建立起新型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伦理指导思想贯穿批评的全部过程。在批评的第一层次,批评者求文本之“真”便遵循着“信”的伦理;在批评的第二层次,批评者论功能之“效”便遵循了“利”的伦理。但是,仅仅满足了“信”的翻译批评常常与翻译现象脱节,仅仅满足“利”又造成了翻译批评指导实践乏力。因此,批评者有必要在批评的第三层次将价值评判的重心从已然转移至未然,站在更高的旁观角度,在具有“导向性”的伦理规范之下对批评对象的价值重新加以审视与评判。本文提出,中医典籍英译批评的导向作用应当表现为批评在道德伦理层次向“善”的追求。

“善”是一个传统的道德伦理概念,但本文所向之“善”并不囿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指向个体内省与自我修身的目标,而是从交往伦理角度考虑,兼具理想与应用维度的“规范合理”之“善”。这一增添的内涵主要来自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商谈伦理学”。吕俊^[43]在其专著《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中首次将哈贝马斯的“商谈

伦理学”引入翻译批评研究领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任何理解和解释“只有反思性的参与才能确保客观性”^{[44]182},而只有“规范合理”才是具有反思性的行为。对中医典籍英译而言,批评向“善”是要“在参与交往活动各方的普遍共识基础上建立起‘规范’”,使翻译活动“成为‘规范合理’而非仅仅‘目的合理’或‘策略合理’的行为”^[45]。“商谈伦理”是具有“规范合理”的交往伦理,它包含强弱两种形式,既寻求满足“每一个人的共有的利益”^{[44]222},也指对话双方经由平等“商谈”而达成的阶段性共识。据此,批评首先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对话作为评价翻译交往行为的最高标准和追求,其次应当尊重交往双方通过各种形式业已达成的阶段性规范共识,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推动下达成的中医概念术语标准化统一成果。如此一来,中医典籍英译批评所向之“善”才能够既被参与“对话”的各方接受,还具有开放性和超越性,并最终在强形式的理想化标准与追求驱使下,为翻译的未来走向提供有益引导。

三、结语

中医典籍既是历史性的文本,同时兼具自然科学的内容和人文写作的形式,研究者对典籍的文本属性和英译功能有着不同的认识,所持有的批评标准便存在较大分歧。针对中医典籍英译批评的现状和问题,本文认为,批评首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而非个人的感悟或鉴赏;应当尽量保持“旁观者”的相对客观,避免落入惟目的是从或主观相对主义的窠臼;应当建立起多层次、多元一体的批评模式,使批评在走向理性化的同时更加系统和全面。当然,批评模式当中的规范和标准应当既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又能满足应用方面的特殊需求,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开放度,才能够在扩大研究语料和语种范围的过程中逐渐由特殊走向一般。

参考文献:

- [1] 沈洁,王宏. 试论哈贝马斯实践哲学视域下《黄帝内经》英译批评模式[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53-61.
- [2] 王宏,沈洁,王翠,等. 典籍英译新发展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136.
- [3] 李照国. 定静安虑而后有得——《黄帝内经》英语翻译随想[J]. 上海翻译,2006(1):63-66.
- [4] 李照国. 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国际化的概念、原则与方法[J]. 中国翻译,2008(4):63-70.
- [5] 李照国. 《黄帝内经》英译得失谈[J]. 中国科技翻译,2009(4):3-7.
- [6] 施蕴中,马冀明,徐征. 《黄帝内经》首部英译本述评[J]. 上海科技翻译,2002(2):46-49.
- [7] 兰凤利. 论《黄帝内经素问》篇名的英译——兼评两个英译本的英译篇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3):265-268.
- [8] 杨晓荣. 翻译批评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9] 兰凤利,梁国庆,张苇航. 中医学中“脏腑”的源流与翻译[J]. 中国科技术语,2010(5):40-45.
- [10] 王彬,叶小宝. 中医典籍中“气”的源流与翻译探析[J]. 中国翻译,2014(2):107-110.
- [11] 李孝英,赵彦春. 语言学视域下中医古籍英译问题探究[J]. 中国外语,2021(6):95-100.
- [12] 范延妮. 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及其影响研究[D].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5.
- [13] 杨丽雯,王银泉. 中西文化交流视阈下文树德《黄帝内经》英译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4):542-544.
- [14] 王尔亮,陈晓. 20世纪中期以来《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研究史述[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38-43.
- [15] 蒋基昌,文娟. 《黄帝内经》四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基于广西中医药大学短期留学生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J]. 学术论坛,2013(1):197-200,210.
- [16] 殷丽. 中医药典籍国内英译本海外接受情况调查及启示——以大中华文库《黄帝内经》英译本为例[J]. 外国语,2017(5):33-43.
- [17] 张晨晨,谭业升. “中医西传”视域下《伤寒论》英译本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150-158.
- [18] 黄培希. 副文本与翻译文化建构——以艾尔萨·威斯《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为例[J]. 上海翻译,2018(3):73-79,95.
- [19] 张焱,王巧宁,张丽. 中国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来”——海外汉学家文树德《黄帝内经》英译研究[J]. 中国文化研究,2019(3):144-154.
- [20] 蒋辰雪. 文树德《黄帝内经》英译本的“深度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2019(5):112-120,190.
- [21] 李洁. 接受理论视角下《黄帝内经》3个英译本的问卷调查分析研究[J]. 中医药导报,2015(7):106-109.
- [22] 袁玮蔓. 晚清来华德国人的中医典籍译介及其学术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2022(5):268-274.
- [23] 张晓枚,陈锋,陈宁,等. 文树德英译本《黄帝内经》文化负载词英译探究[J]. 环球中医药,2018(7):1084-1087.
- [24] 肖平. 《黄帝内经》英译评析[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33-36.
- [25] 刘云虹. 翻译的挑战与批评的责任——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语境下的翻译批评[J]. 中国外语,2014(5):88-95.
- [26] 刘云虹. 意义与翻译批评研究[J]. 外国语,2005(3):37-42.
- [27] 胡艳. 翻译批评理论观照下《内经》三种译本多维度对比研究

- [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
- [28] 刘明,范琳琳,汪顺,等. 中医典籍英译质量评价要素的探讨[J]. 世界中医药,2017(5):1182-1185.
- [29] 郭添枫.《金匱要略》英译本的对比研究[D]. 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8.
- [30] 许钧. 论翻译批评的介入性与导向性——兼评《翻译批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3):432-441,480.
- [31] 许钧. 翻译论(修订本)[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32] 刘云虹. 翻译价值观与翻译批评伦理途径的建构——贝尔曼、韦努蒂、皮姆翻译伦理思想辨析[J]. 中国外语,2013(5):83-88,94.
- [33] 薛华.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5.
- [34] 刘云虹,许钧. 新时期翻译批评的走向、特征与未来发展[J]. 中国翻译,2022(2):5-13,191.
- [35] 李孝英,赵彦春. 中医药走向世界,准确翻译是第一步[N]. 光明日报,2022-04-02(07).
- [36] 刘云虹. 论翻译批评精神的树立[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9):62-65.
- [37]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6.
- [38] 蓝红军. 翻译批评何为:重塑批评的话语力量[J]. 外语教学,2020(3):84-88.
- [39] 杜威. 经验与自然[M]. 傅统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8.
- [40] Veith I.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 [41] 许钧.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 [42]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43] 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 [44] 刘钢. 哈贝马斯与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45] 沈洁,王宏. 试论实践哲学视域下中医典籍英译批评原则[J]. 外语研究,2022(1):79-84.

Criticism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SHEN Ji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00,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Criticism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rospecting and guiding translation practice. New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criticism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rational guidance in the research of “explicit” criticism, the tendency of one-sidedness and simplification in the research of “implicit” criticism, and the lack of ethical relevance of criticism. This paper holds that du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a criticism mode encompassing three levels with multiple dimensions,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seek ‘truth’, discuss ‘effectiveness’, and aspire to ‘goodnes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

Key words: Class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nglish Translation Criticism; Achievements;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